植 物 分 类 学 报 43(5): 392–397(2005)
Acta Phytotaxonomica Sinica http://www.plantsystematics.com

平生风义兼师友——胡秀英博士素描

吴征镒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

My long-lasting and highly-cherished friendship with Dr. S. Y. Hu

WU Zheng-Yi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4, China)

胡秀英女士过了年就是九十七岁,她整整大我八岁多,算来是前清光绪三十四年生(1908年),即辛亥革命前三年。她无疑是中国植物学界的老大姐,论理应该列于老师辈,但她又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博士,所以中国植物学界都尊称她为胡博士(以下均用此称呼)。但看她的学历是1933年在南京金陵女大(Ginling Girls' College)毕业,而正是该年我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生物系,于对日抗战之初毕业。如此说,却又可以算同辈,那就作"师兼友"吧!

我们本有机缘在抗战前相识,因为我的大哥吴白匋、二哥征鉴、五哥征铠都是南京有名的教会办大学金陵大学不同系中毕业的,该校和金女大是姊妹校,相距很近,我五哥还和她同届毕业。何况我还有一位尚未识面的老师,当时金陵大学生物系教授A. N. Steward的植物学助教焦启源(C. Y. Chiao)先生。然而终于没有,这原因恐怕只能从出身上去找,无他,只是因为她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由教会奖励资助,才勉强大学毕业的,毕业时就已二十五岁,又南下到岭南大学深造。我呢,总算出身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虽说是已经破落,北上清华时也已靠五哥半薪资助和领清寒奖学金。几年中我经南京去北京只是一过而已,很少耽搁。

抗战八年中,我只身从宁夏、内蒙,辗转万里到昆明,随即只能困守昆明。李惠林先生倒是有缘会着一面,因为他从苏州东吴大学流亡成都后,经昆明出国留学,曾到西南联合大学的以洋油箱横放代替标本柜的"标本室",访我的老师吴韫珍先生,在他参观标本室时我们见过一面。胡博士当时在成都以西采药,采标本,虽可能后来出国时也路过昆明吧，我却从来没有听到或许她当时并不认识的小同乡郑万钧先生提起过她,更无缘见面了。其实我的老师吴韫珍先生(上海青浦)和我(江苏扬州)都是她的大同乡,应该是有机缘相识的,然而终于没有,这或许是我们都没有教会关系的缘故吧。这里还有一个机缘,我未抓住。1946年,李继侗老师曾为我向哈佛大学要来一张申请留学的表格,我当时一要革命,二无分文路费,没有申报,但如果负笈美国,说不定也就回不到祖国的怀抱了。

解放后,我在国内,胡博士在"美帝"封锁线那边,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然而这时,国内开始计划编辑《中国植物志》了,机缘来了。忘记是哪一年,也不记得经过什么路线,总在1958年,我"跃进"到昆明以后,国内获得了一本胡博士独立写成的"Flora of China"的锦葵科Malvaceae(1955年出版)。记得这本书是红封面,不太厚,仅100页,带图。当时我曾用以

2005-02-02 收稿, 2005-08-10 收修改稿。

鉴定过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锦葵科标本,觉得很有用,很好用,文献也引证很全,直到变种、变型。要找碴儿,只是我认为纪念采集者王启无的*Hibiscus wangianus* S. Y. Hu的花期标本,就是我们已采到果标本,并证明是云南至中南半岛分布的大萼葵*Cenocentrum tonkinense* Gagnep.。这也难怪她,因她所根据以成志书的标本,主要是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的标本,虽然丰富,究竟没有国内之齐全。然而那时,正是左倾思潮泛滥,又在“美帝”封锁中国期间,老实说,心里还在疑惑,莫非“美帝”在和我们竞赛出《中国植物志》吧?!感到要将压力变为动力。那时正好冯国楣先生分工做中国锦葵科,我就除去将这一文献写进《云南种子植物名录》里面外,这本小书也就“宝刀赠壮士”,由冯先生专用和保藏了。

1960年后,还没有十年动乱,我忙里偷闲,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鉴定了昆明植物研究所所藏大批标本,做到冬青科Aquifoliaceae,觉得Loesener的专著未免太旧。那时E. H. Walker的《东亚植物学文献》(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虽在封锁之下,国内仍然有了复印本,从那本补编文献索引里终于找到S. Y. Hu的另一篇宏文巨制——《中国的冬青属》(The Genus *Ilex* in China) (1949–1950)。“按图索骥”和这位S. Y. Hu做了第二回的“文字之交”。众所周知,冬青属是中国长江以南为主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林下主要成分,但比柃属*Eurya* Thunb.、山矾属*Symplocos* Jacq.、紫珠属*Callicarpa* L.等显得尤为重要。果然,顺着她重新整理出来的属下系统,依照分亚属、组、系检索表查去,问题无不迎刃而解。这篇文章到现在为止是当代此属的最新的专著,其中蕴藏无数的该属在中国不同地域中分化和演化的信息,应是弄清广大亚热带森林林型的一把金钥匙。后来《中国植物志》按科分工,我就把这把金钥匙转交给我在十年动乱前夕所收的第一位研究生陈书坤，让他去整理全国的冬青科。最终他又招收了研究生,也以此为题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巧得很,这最近的研究者也是女性,而且是云南的最大少数民族之一傣族的“菩少”(注:傣语里姑娘的意思),她不是别人,却是《Flora of China》的中、外各方面联络秘书朱光华君的贤内助俸宇星。据说他们已添了小宝宝,但我这位谊属老丈的人还没有抱一抱。在这两次以后,我又用过胡博士所做的山梅花属*Philadelphus* L.专著和山柳科Clethraceae、野牡丹科Melastomaceae等论文。野牡丹科有胡博士首先发现的新属长穗花属*Styrophyton* S. Y. Hu,无疑是该科最原始的属之一。

以上我和胡博士的数次文字之交大约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时。

远在八年抗战末期,美国“飞虎队”来昆明驱逐日机,我曾到西南联合大学最初借用的昆华农业学校大楼去见过队中的一位战时从军的女翻译官陈秀英(Luetta Chen),她在国内时曾随广州岭南大学麦克福F. P. Metcalf进行植物研究,后又曾在哈佛大学得E. D. Merrill指导,共同发表中国羊蹄甲属*Bauhinia* L.和清风藤属*Sabia* Colebr.的论著。闲谈中是否有谈到过胡秀英女士?很可能,但搜索枯肠,已记不起。那位女士大概是福建人,雅好修饰,是富家小姐式的,有教名或外国名,但胡博士的教名或外国名呢？文献上显然没有。从这里可以看出,她虽虔诚信教,但却极具爱国爱人民的热诚。

机缘终会有的。在十年动乱刚结束,“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之后不久,美国植物学会(当时该学会主席就是今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Peter H. Raven)派出了以哈佛大学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学者Bogorod教授为首的美国植物学会十人代表团,来中国各大城市参观访问,也到了昆明。团中有阿诺德树木园园长P. A. Howard,还有美籍华人戴威廉、

孔宪铎和后是该团团员、古植物学家J. William Schopf夫人的沈育培女士。记得在学术交流时,我为他们放映了当时科普协会拍摄的在青藏高原上工作的生物学家,其中有我在希夏邦马峰半山采集标本和教学生的活动,后又在介绍中国植物的幻灯片中见到我在定日所摄的以珠穆朗玛、卓奥友诸高峰为背景的个人野外工作照片,大约都给这批也是第一批建国后访问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美国朋友以较深刻的印象,从此,小同乡戴威廉就称呼我为“ 吴老 ”,我那时已是六十开外。

第二年即1979年5月间,中国科学院也以中国植物学会名义,回敬了一个十人代表团,团长由生理、生化学家汤佩松院士担任,我任副团长,团员有分类学家北京植物园的俞德浚院士、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殷宏章院士、形态和古生物学家徐仁(代表北京)、古生物学家李星学(代表南京)两位院士,还有南京中山植物园盛诚桂教授,和最年轻的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方圣鼎,及外事局官员苏凤林。时到2005年,我和李星学成为硕果仅存的二人,方君后来则留学美国未归。我们经巴黎略停数日,跨大西洋的飞机到达的不是纽约,而是华盛顿,自然是需要在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要和使馆接头的缘故。在此参观美国科学院并到白宫,全体团员曾经在爱因斯坦大胸像前合影。而后第二、三站是马里兰大学和耶鲁大学,在前者我结识了J. F. Reveal教授,一位植物系统学家,在他主持的生物馆前种着正开花的北美东部的*Halesia macgregorii* Chun(安息香科Styracaceae的银钟花,中国华东(浙江)至粤北散生的种,正是哈佛校友陈焕镛先生发现的。Reveal大约对我的工作已有所知,他请我在有着扶手椅的教室里初次报告了“ 东亚-北美东北区系的关系 ”。耶鲁大学是我老师李继侗院士的母校,他的优秀的博士论文至今还留在该校档案中。我们去访问,主要是在十多层的新生理学大楼。那里有Galstone教授,他是对中国友好的生理学家,早已访问过汤、殷俩院士。但我和徐、李俩院士却访问了在楼里的Osborn Laboratory,看到他们正开始研究煤核中的古化石果实的种子。第四站才轮到波士顿,当然是Bogorod教授和Howard园长出面接待,在该城主要参观访问了这两处。哈佛大学标本室由原有的格雷标本室(Gray Herbarium)和阿诺德树木园(Arnold Arboretum)标本室联合组成,国际代号为AA,设哈佛大学内。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文字之交已达10余年,渴望会面的胡博士。原来她是一位看上去非常善良朴素,像是从农村刚出来的小老太太。当时她年逾古稀,已退休,但哈佛为她在标本室内专留下一小间工作室。她特地在中国餐馆宴请了我和俞院士二人,由Howard作陪。闲谈间我才知道她也是江苏人,生在徐州,和郑万钧是小同乡,奇怪的是她那时的容颜和以后数次聚晤,都是差仿不多,看来她真是驻颜有术。直到九十四岁那次会面还是如此。那次初见面时间过于短促,但印象极深,相见恨晚。交谈中不但知道“ 中国的冬青 ”就是她的博士论文,还知道她曾有雄心,独立进行中国植物志的研究,并就两个疑难度最大的菊科和兰科收集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次会见促使她将这两大箱文献全部无偿赠与北京植物所,因为那时俞老正在为《中国植物志》掌舵。这时我心中的疑团终于消失——原来并不是“ 美帝 ”要和我们竞赛出《中国植物志》。我们在Howard和S. A. Spongberg陪同下,于参观阿诺德树木园之后,代表团还同到Illinois的Ann Arber,以后就一分为二了。汤老率领殷宏章、方圣鼎二人,由孔宪铎相陪,往北到Minnesota,我率其他六人,由戴威廉和沈女士陪同,经纽约郊外向南到North Carolina去了。

1979年到1990年十一年间,在她寄赠俞老两大箱文献之后,我曾向她函索《Compositae

of China》(1964)一书,因该书是在台湾出版的,大陆当时看不到,但她却寄来了根据林学家华敬灿在水杉发现地——湖北利川系统采集的标本鉴定后的结果写成的有关“ 水杉区系 ”和“ 中国是保存中心 ”的有名论文《The *metasequoia* flora and its phytogeographic significance》(1980),或许《Compositae in China》已送完了。

更大的相聚机缘终于来了,那是在我第三次访美、第二次访哈佛的1990年。那年中美合作,进行《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的英文修订版)的计划已大体就绪,双方的联合编委会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召开,会后美方安排我在哈佛大学标本室和密苏里植物园标本室工作两个多月,然后经旧金山、夏威夷返国。在波城的居停主人就是胡博士。那次的波城之行,我是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齐书莹和我所李恒研究员先到加拿大,从温哥华由西到东,直到蒙特利尔,那是中国植物区系大课题的对外交流活动,目的是为东亚和北美东北部的9型间断分布找材料。我们在温哥华和蒙特利尔都访问了那里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然后经五大湖区观Niagara大瀑布,我和她们分手,直飞波城,而我的夫人则从国内起程,也直飞波城,在阿诺德树木园相会,因为我那时(从1983年起)摔成左股股骨头粉碎性骨折后,虽然已经接好,却须扶杖而行,毕竟年龄也已经74岁了,要夫人照顾。我们夫妇在阿诺德树木园会合后的第二天就要搬到B区的胡博士家,步我们在北大中关园的老邻居马毓泉(植物分类学家,内蒙古大学教授)夫妇的后尘,住到胡家。胡家独门独户,明二暗三的楼房,在住宅区内颇为宽敞。她把地下室出租给哈佛大学的同事,自己住三楼,我们则在二楼,那层同时还有客厅和厨房。饭厅、桌、浴室等近代设备一应俱全。据说我们走了以后,接着是我所李锡文、陈介、武素功等住,反正是“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大概这就是美方在哈佛的接待站,由《Flora of China》的经费补贴胡博士。前后相继的中国客人都觉得宾至如归。当时胡博士虽已过耄龄,还每天自己驱车接送这些不断头的客人,也真劳苦她老人家了。有次我在车中,问她何以如此高龄还是反应很快,敢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跑车,她说她来美国以后,每天接送她的博士导师E. D. Merrill园长多年,完全是锻炼出来的。在美国没有开车本领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从此我就再不替她担心,大概这也是她以90高龄仍然能在城市(如香港)郊外,进行野外工作的本钱吧?我们实是自愧不如。

海湾战争刚起,她在车中就和我们夫妇说“ 又要打仗了 ”,言下之意,即是“ 要和平,不要战争 ”,同时也流露出对“ 第二故乡 ”美国人民的热爱,是和爱她的祖国和祖国人民一样的深厚。

她为人很沉静朴素,不苟言笑,说话也很有分寸,却也很开朗,也很不见她和多少外国朋友交往。每天早出晚归,早上从三楼下来,傍晚回来也就上了楼。在饭厅里遇着她也是自己做自己吃。我们用她厨房里的设备,也是自做自吃。中午都不回来,她就在她的“ 书似青山常乱叠 ”的小工作室里吃带去的冷餐。此时也不大出来和我们夫妇一齐吃,但她曾向我们介绍过一种比较廉价、专涂面包的鱼罐头,这或许也是她的驻颜术和不老方吧?每饭不管有多少客人,她都要祈祷。总之,三餐都吃得很简单。生活得既像一位女学者,更像一位清教徒。因此我们夫妇就客随主便,第一个星期天陪她去住宅附近的一座小礼拜堂,她去做礼拜。我们则虽然旁观,却也欣赏那沉潜肃穆的宗教氛围,信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主张信教自由的。以后因为我们一位侄儿夫妇也住在波城,就由他们来接我俩出去走走,从那里的海洋公园,到长满玫瑰*Rosa rugosa* Thunb.和楤木*Aralia chinensis* L.的真正海滨。

日子宁静地过得很快,两个多月看了十几个大中小科,包括我那时负责的紫堇科Fumariaceae、石竹科Caryophyllaceae、秋海棠科Begoniaceae。我们夫妇在她家聚了一次餐,还请了D. Boufford,他在用微机管理标本室,在一个星期日还驱车很远,去找一小片(真正一小片)美国产的蓝果树*Nyssa* L.的活植株,我们少数几个人初次尝到了胡博士做的拿手菜圣诞节烤火鸡,她给我们夫妇预付了圣诞节的祝福。

这之后又过了七年,未能遇到她,她何时抛弃第二故乡,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呢？我想大约是香港回归前几年,转到香港中文大学,能得到毕培熙(P. H. But)先生的照顾的缘故吧？就在这几年中,她向我通函,介绍一位原任香港英国大使馆职员的夫人Mrs. B. M. Walden来昆,她是一位凭业余爱好为兰科植物写生的画家,到昆明来为当地的野生兰就地描写。终于来了,我已将近八十,跑不动野外,乃转请陈介陪她,而她是和胡博士合作的,曾在2001年出了一本288页,含516种约150幅野外写生图的著作。她们大约是在香港野外遇合的吧？那几年我和这位Walden夫人还互通过贺卡。曾孝濂植物画师到香港中文大学为胡博士准备完成新版《香港植物志》画植物图,去了一年多,也在这个时候。香港中文大学还特地派代表团访问昆明。1996年,我八十岁时借机召开了世界性的“东亚植物区系学术讨论会”,请了胡博士,但她未能来。

1997年终于迎来了和胡博士共同采标本的良机。《中国植物志》英文版邀请了台湾中研院的代表参加中方编委,大陆学者有了参加台湾学术会议的机遇。中国学者的队伍中,就有当时已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胡博士,她也和我们一样都是第一次到台湾。我们就住在该校,办访台手续。到台开完会后,周游台湾全省,到台东太鲁阁后分手,年轻一些的都上阿里山看“神木”去了,留下我们两人,一个八十九,一个八十一了,怕出意外,而由居停主人彭镜毅博士陪同,驱车向南,经高雄鹅峦鼻等处畅游了台南。胡博士和我们夫妇由居停主人和管理保护区的人相伴,在海滨草地和海岸林中徜徉,颇多收获。晚归后,因大部分是平地,故老人并不觉吃力,胡博士健步如飞,望之如五六十岁人。整理记录标本,我还有夫人帮助,而胡博士却独自一人,常到深夜,一丝不苟地边记录边压制,谈笑自如,使我们既惊异艳羡,又衷心佩服。

这是我将近最后的一次野外考察,以后全力笔耕,据闻胡博士仍然跑野外,并畅游国内的名山大川,这是她94岁高龄来访昆明时告诉我的。香港中文大学为她庆九十华诞时(1998年),曾来征文,那时我正忙于写《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便与弟子彭华就有关菊科原始族大丁草族Mutiseae中三个疑难属的旧稿进行了改写,对这三属做了初步清理,“披头散发”地寄去。此举实属班门弄斧,但确有登门求教之意。后来纪念刊久久未见,至今不知何故。说来凑巧,在此前后,重庆市西南师范大学的戴蕃晋老先生庆百岁,也来征文,我一时间忙得手忙脚乱,只好以刚写成的“综论”中的山茱萸亚纲Cornidae的一大节寄去,因为在该亚纲中都是古子遗科属,而且都基本是古特有,大都在四川见到。戴老实是当时中国植物学界的老大哥,今年该103岁了。这中间,上一次“中国植物学会年会”在深圳举行,在仙湖植物园的学术报告厅里,我听到胡博士谈菊科,她说根据香港材料,把斑鸠菊属*Vernonia* Schreber一分为三。

大约在2002年,她来访昆明,临行前忽来告别,真如突来喜讯,因我事先不知道,实未能尽地主之谊,深为憾事,她虽有香港中文大学同事陪同,但步履自如,风度不减1979年间的初

晤,临别时她忽在我的右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当时我并不明白,这是老大姐对小弟弟的爱抚和告别礼节,不知所措。

昔者东坡有诗云: "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胡博士和我的交往,是在她的古稀之年后遭际的,虽已经快二十五年,实际也不超过六、七次,为时三月不到,看来纯属偶然,然而仔细想来,偶然之中,实在有着必然。这是因为我们在抗战八年中的艰苦岁月里,曾经 " 同是天涯沦落人 " ,而又曾经在大荒漠上,同是从不同方向来向一个目标前进的 " 求真者pilgrim " *,而后又因都毕生从事于植物分类和经济植物,而又同逢盛世,在祖国的怀抱里,又可能在深圳第二次相遇,希望在若干年后第三次相遇,那时我已百岁,胡博士则是一百零八,我仍然是小弟弟。

胡博士的著作极多,可谓" 著作等身 ",但直到最近,我才看到她的著作目录。她从1937年至2001年的64年中,共刊出162种,大多数是用英文写的,但也有不少中文巨著,其中大量的是有关经济植物。" 中国的补品 "(硕士论文),从人参(系列文)一直到中草药、" 凉茶 "、" 马蹄 " (荸荠的两广名),无所不有。非常可惜的是,她在国外《Economic Botany》杂志上发表和在迁居香港中文大学时发表的大量著作,我都无缘拜读和应用,使我深感读书太少,见闻不广,愧怍之至。国内大多数学者或也如此吧?! 我想就此建议仙湖植物园就近将这些著作搜集在一处,汇编成胡博士著 " 经济植物学专著集 " ,有些应译成中文,以饷广大读者。这样,所起作用可就大了。我想这也是她一片爱祖国、爱人民的苦衷,和终生从事的实事。如能得以大白于天下,而成为祖国人民的珍贵遗产,当为不朽之盛事。如观其成,我将为之 " 浮一大白 "。

---

* 注: " 求真者 " 是我在青年时代写的一首新体诗,是从我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中过鄂尔多斯高原荒漠的感受,以隐喻当时学术界的荒凉寂寞,原稿在 " 十年动乱 " 前夕为人借抄未还,终致遗失,只记得其中一句: " 斗大的朝阳已在东方升起 " ,这是荒漠中的实景。